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六辑）

国家经济学

〔德〕李士特（F. List）著 王开化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· 经济学（第六辑）

国家经济学

〔德〕李士特（E. List）著 王开化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家经济学/ (德) 李士特 (List, F.) 著; 王开化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203-3

I. ①国… II. ①李…②王… III. ①历史学派②经济思想—德国—近代 IV. ①F091.3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6315号

国家经济学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26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203-3/F.395

定价: 116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棒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〔德〕李士特（F. List）著 王開化 譯

國家經濟學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初版



李 士 特 畫 像

魏序

王開化君以所譯李士特經濟學徵序於余，李氏之書主張以保護政策獎勵國內實業，抑遏外貨。夫以實業未全盛之國家，欲使本國不爲他人市場，則保護政策尙已。李氏、德人，其時德國實業幼稚，加以國內稅卡遍設，關稅廢弛，故其說深足重視。然以視中國今日情形，則又不啻爲中國道也。中國關稅不得自由增訂稅率，重以國人日趨歐化，至使外貨充斥，國內工業，因之失敗。生產力弱，凡百所需，仰給於人，則李氏之說，固宜爲中國所當採法者矣。以中國人口之衆，土地之大，物產之富，使得盡力從事生產，受其賜者豈惟一國。乃近日列強固於目前私利，竟多方束縛，使此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不能發展其固有之能力，損失之大，經濟學者寧能忽之。然則保護政策，殆又非僅爲一國利害計也。王君譯此以饗國人，深望國人能細察之。抑更有說，中國以受不平等條約拘束，保護政策能行與否，全視國人自覺心爲轉移。衆志成城，亦在國人奮勉而已。若只圖小近，樂於苟安，不謀根本之方，且託庇外人，助長外力，罄鉅金以實外庫，逞私忿以召外侮，滔滔者自速滅亡。保護政策將何託哉！此又讀斯譯者所當猛省者也。

民國十四年六月魏宸組序於柏林駐德使署

譯者原序

李士特國家經濟學 (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) 一書，根據當時各國歷史上之事實，說明工商業幼稚國家實行保護關稅制之利益。歐美二大陸各國工業之興，今日能與英人相頡頏者，李氏之說，實與有力焉。

當十九世紀中葉，歐美多數國家，僅受一工業霸權者（英國）之壓迫，已覺大有不可終日之勢；今日我國一國，備受全世界強暴工業國家之剝奪，以致農業衰落，工商凋零，航業與凡百交通機關，均落於外人之手，財政經濟——海關、鹽稅、銀行業等——全爲外人所把持，外人之陸軍兵艦，可以隨意往來中國沿海，出入腹地各埠，外人犯罪，不受中國法庭之裁判，是名爲一獨立國，實尚不及列強一殖民地，國人於此，所受之痛苦，所懷之感想，果何如乎？

近二十年來，國人感受外人經濟之壓迫，力謀振興工商業，然而工商業之彫零如故；所以然者，蓋以我國海關爲外人所把持，不能實行保護關稅制，以高稅或禁止其足以妨害國內工業發達之外貨故也。是以我國欲謀富強，非振興工商業不可，欲振興工商業，非驅除外貨在內國市場之競爭，而使國貨穩占內國市場莫由。保護關稅制者，即驅除外貨之良策，保護工商之利器也。望國人努力謀取消我國與外人所訂關稅協定之亡國條約，實行保護關稅制，則工商業可興，國家前途，庶有豸乎？

李氏之書，已經國人多次介紹；惟往往摘錄一斑，未呈全豹。開化近數月來，讀李氏之書，極服膺其言，且以爲針灸我國現下病症之良藥，故譯而出之，以供愛國君子與治經濟學者之研究焉。

又譯此書，爲日極短，但求無背於原意，未遑修飾辭句。譯稿既竟，復經吾友楊奎廷君校閱一次，無任銘感。國內賢達苟再進而教之，則又開化所夙夕翹盼者也。

民國十四年五月鄧縣王開化序於德國杜平根大學

原序撮要

自吾懷疑於政治經濟學之時流學說（即亞丹斯密派之學說）究竟合於真理與否，而思努力研究吾所見爲錯誤及其所以錯誤之根本原因者，於今已三十有三年矣。吾之職業（爲大學教授）乃予吾以擔任此工作之動機——吾之命運所必須遭遇之一切反對，乃迫吾對此工作更向深處追求。

與我同時之德人，當尙能記憶，在一八一八年時，德國之國計民生極其艱難。吾卽於其時，準備盡取政治經濟學之一切著作而研究之。吾亦如他人然，關於斯學之所思所著者，無不盡知之。但對青年教授經濟學，而出之以現在之方式，吾殊不滿意；吾寧願教彼等以當採用如何之商業政策，而後德國之幸福、文化、與權力，始可因之而增進。時流學派所諄諄然教誨者，惟商業自由之原理。若觀察法國內地省境稅取銷之結果，觀察英倫三島聯立於大不列顛統一政府下之結果，則商業自由之原理，未始不參諸常識而相合，證諸經驗而無違。然拿破崙大陸制之可驚的利益結果，及此制取銷後之破壞結果，又爲近而且著之事實，不容吾人之忽視；此等結果，恰與吾前所觀察者相矛盾。及努力考察此矛盾之所由生，始知時流派之學說，本自有其真實不誤者在，惟必須世界各國均相互遵守此自由商業原理，如在一國中之各省然，而後其說始能行之而無弊。此遂導我入於『國家性』（nationality）之研究。吾於是始知時流學說特一方只見有全人類，他方只見有各個人，而未知介於其間者，尙有所謂『國家』者在。

也。若兩國之文化程度已甚高，兩國工業之發展甚相若，則採用自由競爭之政策，實於兩國均有利益；若一國之工業，商業，航業，不幸落後於其他各國者甚遠，而其所有之精神的物質的富源，又大可以助此諸業之發展，此等國家第一必須強固其本國之一切能力，使足與其他先進國自由競爭時，能相持而不敗；此固吾人所見甚明者也。總而言之，吾今乃見『世界經濟』與『政治經濟』間之區別矣。吾覺德國必須取銷其內地一切稅卡，當採用一公共一致的對外之商業政策，使其工商業之發展，能達於其他國家各由其本國特有之商業政策所曾達到之地位。

一八一九年德國新政治組織之計畫方案，如雨後春筍，茁然齊發。貴族與平民，統治者與被治者，國家官吏與文人學士，對於茲事，殆無不縈心而注目焉。德國斯時，殆如一甫遭兵燹之產業，其產業主方汲汲然圖謀所以恢復之道。有以爲事事物物，皆當恢復原狀，纖細靡遺者；有以爲當翻然變計，全易舊觀者；亦有參諸常識與經驗，中道而行，融合過去之要求於現在需要之中者。處處有意見之衝突與矛盾，處處有爲促進愛國目的而成立之同盟與聯合。國會之憲法甫經創定，殆等於急就章，但有識見有思想之外交家，則皆視之爲一胚胎，更完善之事物狀態，將來可望由之孕育而出。憲法之第十九條，已明白規定設立一『國家商業制度』(National Commercial System)。此條之條文，自吾視之，實日耳曼祖國將來工商業發展之一基石；其後組織德國工商業者之聯盟，以取銷吾人之內地稅，而採用一全德之公共商業政策，凡此種種觀念，皆由此條之條文所激發也。至此聯盟如何植其根柢，如何使在巴威 (Bavaria) 與符騰堡 (Württemberg) 之材識明通之統治者，有聯合之行動，如何使有日耳曼關稅

同盟之成立，此固人人所習知，勿待贅述也。

時吾爲日耳曼商業聯盟之顧問，吾所處地位之艱屯，殆不可以言喻。凡有智識之政府官吏，報館主筆，凡政治經濟學之著作者或教授，無不醉心於大同主義學派，而視一切保護稅爲『學理上之尤物』(Theoretical Abomination)。彼輩有英國之利益以助之，有德國各埠及各商業城市之英貨販賣者之利益以助之，故無往而不勝利。尤可痛者，英國內閣善利用『金錢勢力』，箝制海外輿論，苟於其商業利益有濟，則揮金如土，從未有所吝惜。大隊之通信員，領袖著作家，自漢堡與不來梅，自來比錫 (Leipzig) 與法蘭克福 (Frankfort)，浪遊各地，專從事於攻擊德國工業家要求施行保護稅之『無理的願望』，又以梅曼鄙悖之辭，斥責此商業聯盟之顧問，(即李士特本人)，如謂彼完全昧於今世科學名家所盛道之政治經濟學之第一義，或謂其腦筋之遲鈍，不足以解此。時流學說與德國學者之意見，既皆傾向於彼輩，以故爲英格蘭利益辯護者之工作，尤屬易易也。

雙方對壘之武器，顯然決不相等。一方爲已著名而能自圓之學說，爲整固而無破綻之學派，爲在各立法機關各學會中均有其辯護人之強有力的黨部，但尙有一最大之原動力，即金錢。他方則爲貧乏，困窮，內部分裂，意見紛歧，學說基礎之絕對缺乏。

在與若輩日日辯駁之進程中，吾乃認識『價值說』(The Theory of Value) 與『生產力說』(The Theory of the Powers of Production) 之區別，並明白時流學派假『資本』一辭所推演之虛偽論證。吾亦由是漸知